

增量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 政治理念发展的演变

肖存良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中国政治发展存在双重维度：政治制度发展和政治理念发展。国内学者在政治发展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用政治体制改革遮蔽政治理念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由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尚不全面、不系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政治发展理念，形成了不同政治增量，建构了增量发展的政治发展态势。增量发展体现为三种类型：一是直接添加政治增量；二是在细化、具体化原有政治理念过程中添加政治增量；三是在改变原有政治理念过程中添加政治增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将继续走增量发展道路，只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全部掌握之后，我国的政治发展才有可能走出增量发展形态，进入更高一级的新发展形态。

关键词：改革开放；政治发展；增量发展；政治理念发展

中图分类号：D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8)06-0147-08

一、中国政治发展的双重维度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政治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分为两个维度：政治制度维度和政治理念维度。前者是政治制度发展，即以国家政治制度为核心，以民主化、权力变化、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世俗化等为标志的政治发展方式。后者是政治理念发展，即以中国共产党为发展主体、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治国理政理念变化为标志的政治发展方式。政治制度发展又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政治制度变革，另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前者关注国家政治制度的整体转型，后者在国家政治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关注政治体系运作方式、体制机制和权力结构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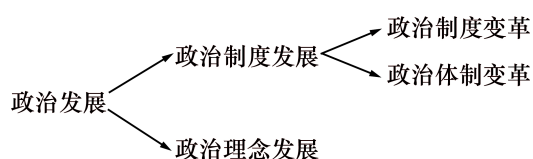


图1 政治发展的类型分析

政治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民主转型、社会稳定，克服政治腐败，化解政治危机以及如何完成政治文化改造等^{1}。有的学者将西方政治发展研究主要归纳为政治民主化研究、政治变革研究和政治发展的危机与结果研究三大类^[2]。也有的学者把政治发展概括为政治民主化与政治稳定两个方面^[3]。无论哪种分类，都关涉到政治制度。亨廷顿主要从政治制度化的视角来认识政治发展，他认为政治发展意味着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政治制度化以适应政治参与扩大化的要求^[4]。

西方学者在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时，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变革维度来认识。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必然会推动中国改变国家政治制度并向西方政治制度转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西方学者把这个过程称为“民主转型”，并且产生了民主转型的政治学理论^{[1](64)}。西方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也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革和民主转型，认为政治现代化就是政治民主化、自由化和分权化，“代议制政府，尽管有形式或内在精神的差异，对所有社会都是最理想的政治体制^[5]。”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先行者，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因而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同质化、

收稿日期：2018-03-09；修回日期：2018-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四个全面’战略研究”（2015MZD004）

作者简介：肖存良（1976—），男，湖南衡阳人，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政党政治、人民政协与统一战线，联系邮箱：clxiao@fudan.edu.cn

革命化、进步化、全球化的不可逆过程^{[1](58)}。当中国的政治发展沿着自身的发展逻辑,没有朝西方学者所预期的方向发展的时候,西方学者普遍以“经济改革,政治保守”^[6]来指称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在政治上坚持保守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政治的发展成果乏善可陈,乃至没有进步。

除了极少数认同西方价值观的学者之外,国内大部分学者并没有从政治制度变革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政治发展,并不认为政治发展就是要改变国家政治制度,而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政治发展,认为中国政治发展主要是指政治体制改革。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突破口问题,四十年来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先后提出了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增量民主、人大民主、协商民主、依法治国和公民社会等多种研究视角,主张以上述方面为突破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当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朝着部分学者预期的方向前进或者在前进过程中没有达到某些学者心理预期时,国内有的学者就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实质性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存在一定的停滞与倒退^[7]。有学者指出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8],也有部分学者在认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速度太慢的基础上,提出需要“以时间换时机”“以时间换空间”^[9]的议论,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持谨慎态度。

国内学者在论述政治发展的时候往往存在一个通病,普遍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理念发展混淆起来,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不加区分。有的研究前半部分从政治体制改革角度谈政治发展,后半部分从政治理念发展角度谈政治发展^[10]。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理念发展属于政治发展的两个不同维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从政治体制机制这个政治客体出发而实施的改革措施,而政治理念发展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主体出发而进行的理论创新。前者主要涉及制度与制度化,后者主要涉及理念与理念发展。前者是一种政治行为,后者是一种政治理念,前者以制度为主体,后者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先有政治理念发展,后才有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如改革开放以来,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改革党政关系,建立公务员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国家

监察委员会,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等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而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自信等属于政治理念发展。国内学者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理念发展混淆起来,实际上以政治体制改革遮蔽了政治理念发展这一重要政治发展维度,致使对四十年来政治理念发展成就视而不见。由于“政治发展”是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时提出的政治概念,具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西方学者以西方为模板来审视发展中国的政治发展,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必然采取西方的政治发展模式,自然会有意识地忽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理念发展。

从政治制度发展的角度出发,即从政治制度变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两个角度出发,都容易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政治发展持悲观或谨慎态度。但是从政治制度层面进入政治理念层面来考察改革开放四十年政治发展,就会一扫悲观态度,看到四十年来中国波澜壮阔的政治理念发展进程,感叹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的巨大发展变化,感受到改革开放展现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番图景。

文章从政治理念发展的角度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治发展四十年的历程,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提出新的政治发展理念,建构政治发展增量,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日益丰富,形成了增量发展的政治态势。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政治增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由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而言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缺乏实践经验,只能向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学习。受苏联模式影响,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辅之以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并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和道路并没有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反而导致其经济衰败,民生凋

敝。“在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间，其发展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1](237)}

“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11](237)}必须改革旧的发展模式，寻找新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曾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当然，在改革中也有不同意见，但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开放。”^{[12](265)}“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12](223)}1949年以后的经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决定要寻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教训、寻找新的发展道路之时，并没有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简单地否定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直接转变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西方学者所谓的“民主转型”。而是认为以往发展的不成功，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失败了，社会主义本身并没有错，错在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12](137)}没有采取正确的路径来建设社会主义。总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12](227)}。“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1](313)}“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13](376)}

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这也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13](154)}。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2](2-3)}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意味着既不

能按照过去三十年的模式发展，不能模仿苏联模式，也不能背离社会主义，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规律、体系和制度只能由中国共产党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探索。而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走好这条道路同样缺乏理论和实践经验，只能在于中学，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摸索经验，形成默会知识之后再逐步推进。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当家人，对于这一点说得很直白，“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主义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也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于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2](258-259)}。“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到，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13](401)}。要“走一步，总结一下经验，有错误就改，不使小错误变成大错误，这是我们遵循的原则”^{[13](411)}。“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13](459)}。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探索性、渐进性、开放性和创新性，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张白纸上画出美丽的图画。这种特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一开始就全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规律并提出完整系统的执政理念，只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认识的逐步深化而不断提出新的执政理念。新理念与原有理念或有机融合，或叠加重构，形成新的政治发展增量。

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继承原有执政理念基础上不断提出新执政理念的政治发展形态称为增量发展。增量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政治发展主体，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为政治发展研究对象，指出他们在领导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既注重继承前人，又注重开拓创新，增加前人没有的东西。

增量发展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4]。“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级阶段。”^{[15](296-297)}因而“人们的认识，不论对

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15](283)}。增量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而进行理论深化的政治发展形态。

增量发展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增量发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基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轨道上的政治发展,意味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其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认识的深化,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轨道的发展就不再属于增量发展范畴。第二,增量发展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渐进性,不存在后任否认前任,只存在后任继承与丰富前任,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而是一代接着一代干。第三,增量发展是一种开放式发展,体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认识的不断深入,使中国的政治发展逐渐全面、系统和成熟。第四,增量发展添加政治的增量不是政治理念之间滚雪球一样的机械相加,而是政治理念的有机融合或重构,后面的政治理念不断融合或重构前面的政治理念,或者在融合或重构过程中扬弃旧的政治理念,提出新的政治理念。第五,增量发展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增量改革,也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增量民主,不是在存量之外增加一块新的增量,然后由增量逐渐替代存量^[16]。邓小平多次讲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固定的存量,不能用增量改革和增量民主来解释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第六,增量发展也具有自身的内在限度,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的全面把握,中国的政治发展将走出增量发展时代,进入一种新的更高一级的政治发展形态。

三、增量发展的三种类型

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过程中,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17](170)},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8}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全面和深化,其成果在党的治国理政理念上,体现为

不同时期添加不同政治增量,建构了增量发展的政治发展形态。

(一) 在原有政治理念上直接添加政治增量,形成新政治理念,新政治理念比原有政治理念更加成熟、完整、系统和全面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导人添加了不同的政治增量。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中,主要从反面即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来认识社会主义,而不是从正面即社会主义是什么来认识社会主义。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2](225)},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12](139)}。解决前者需要发展生产力,解决后者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就需要搞改革开放,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邓小平曾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11](194)},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理念。江泽民同志在此基础上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19](455)},开展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教育活动^{[20](360)},提出了政治建设理念。胡锦涛同志先后提出了社会建设^{[21](274)}和文化建设理念^{[21](538)},并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17](609)}。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他直接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2](393)},并在已有基础上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政治理念比任何单一理念都更为全面系统,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一种直接添加政治增量的政治发展形态。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增量发展历程。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之后,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是两个基本点之一,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指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整体实现小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11](237)}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他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19](513)}“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28)}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都把加强党的建

设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要全面整党^{[11](37)}。江泽民同志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20](496)}习近平同志在继承前人、总结过往探索经验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发展战略，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22](2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原有基础上添加政治增量，并形成新政治理念。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邓小平同志先后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2](28)}。胡锦涛同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文明概念，指出“按照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来推进各方面工作，党和国家事业一定能更好地向前发展。”^{[21](29)}习近平同志把“三大文明”发展成为“五大文明”，指出到2035年，“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18](29)}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等三大自信^{[17](625)}。习近平同志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2](349)}从而把“三个自信”发展成为“四个自信”。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认识上，也经历了从邓小平时期的“富强民主文明”^[23]、胡锦涛时期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21](620)}到习近平新时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18](29)}的发展历程。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邓小平同志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2](368)}，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2](375)}，提出了开放发展的理念。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4]形成了创新发展的政治理念。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建设国家创新体系^{[17](597)}，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17](2)}，并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7](540)}的共享发展思想。习近平在总结以往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从而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五大发展理念^{[22](197)}。习近平同志指出，“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22](197)}

(二) 把原有政治理念细化、具体化，使原有政治理念从比较模糊到清晰具体，并在此过程中建构新政治理念，实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阶段式和波浪式发展

关于我国现代化发展目标和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随着实践的深入而日益具体化、阶段化和指标化。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之时，邓小平在回答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目标问题时说，“我说所谓四个现代化，只能搞个‘小康之家’，比如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13](140)}至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语焉不详，因为当时认识尚处于模糊阶段。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时候，邓小平对现代化目标的认识有所深化，“到本世纪末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定了，这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12](16)}这二十年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12](9)}发展的具体指标就是在原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美元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人均1000美元，后为保险起见，把小康社会的目标调整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邓小平此时形成了比较具体的翻两番、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时候，邓小平在翻两番、两步走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2](251)}

邓小平同志主要规划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发展目标，对于21世纪30~50年的发展同样语焉不详。进入新世纪之后，在前两步发展目标已经实现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把第三步发展目标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两个一百年”思想，即“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4)}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至于建国一百年时的发展目标,江泽民同志同样只展望了远景,未进行具体规划。习近平同志则对2020年至2050年的发展目标进行了具体规划,他把这三十年又划分为两个十五年,“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8](28)}“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8](29)}“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18](29)}至此,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由改革开放至二十一世纪中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历程,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政治理念。

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有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11](236)}此次讲话开启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表达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1](231)}的宏观思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概念,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判断^{[19](201)}。1990年,邓小平在已有探索上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2](364)}到1992年,邓小平经过多年思索,终于在理论上十分清晰地回答了计划与市场关系,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2](373)}

邓小平清除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意识形态障碍,江泽民则在此基础上直接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198-205)},他说,“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19](226)}“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25](75)}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深化。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1](62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转变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25](77)}。习近平同志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他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25](77)}。当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25](77)}。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25](77)}“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25](77)}经过改革开放之后几十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对计划与市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科学的认识,这既是一个理念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添加政治增量的过程。

(三) 随着实践的发展,把以前的一些政治理念变为新政治理念,新政治理念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

自党的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表述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能力已经不再落后,“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世界前列”^{[18](11)}。同时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不再限于物质文化方面,“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8](11)}。我国社会“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18](11)}。因而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宣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18](11)}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创新,也是添加政治增量的一种方式。

在社会建设领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之后,

江泽民同志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20](108)}。胡锦涛同志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17](499)}。习近平同志以治理取代管理，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把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指出“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25](90)}。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认识的深化，同时在深化过程中添加了政治增量。

四、结论

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政治发展，政治理念发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不能用政治体制改革遮蔽政治理念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大亮点在于政治理念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18](10-11)}表明新时代依然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轨道之上。增量发展的基础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依然处于增量发展状态，政治理念发展在未来三十年中还会走增量发展道路。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体系完全成熟时，才有可能走出增量发展道路，到那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完全定型了，中国政治发展将进入更高一级的新发展形态。

参考文献：

[1] 燕继荣. 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2] 罗纳德·H. 奇尔科特. 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300.
- [3] 姚建宗. 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J]. 政治学研究，1999(4)：78-89.
- [4]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51.
- [5] 戴维·E. 阿普特. 现代化的政治[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
- [6] 沈大伟.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38-48.
- [7] 王贵秀. 艰难而漫长的改革——政治改革二十周年反思[J]//刘智峰. 1978~1999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32.
- [8] 金太军. 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3)：83.
- [9] 朱光磊. 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中的若干思维方式问题论析[J]. 天津社会科学，2005(6)：5-9.
- [10] 胡穗，吕普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宏观考察[J]. 政治学研究，2008(2)：8-15.
- [1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3] 邓小平思想年谱[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0.
- [1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 俞可平.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9.
- [17]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9]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0]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1]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3]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组织专家选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366.
- [24]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3.
-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XIAO Cunliang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double dimens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litic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ideas. And the common problem among domestic scholars is to confuse the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ideas. In fact,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cannot be used to obscure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ideas.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been on the road of socialist politic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uring which process, owing to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or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socialist rul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ur Party leaders and state leaders put forward different political idea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hence forming different political increments and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trend of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can be embodied in three types: one is the directly-added political increment, the second is political increment added in the refining and specifying process, and the third is that added in the process of modifying the original political idea.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ill still take the above path of the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Only when the rul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fully mastered, can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step out of the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enter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t a higher level.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ideas

[编辑: 游玉佩]

(上接第 131 页)

Study on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based on benefit game

LU Shan, LI D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By considering comprehensively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by using the theory of static game and dynamic game, the present study constructs and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choic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main body in the process of non-gree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game behavior. Findings show that by joining the triple driving effects of the government on producers and operators in such three aspects as ideas, system and benefit, the behaviors of economic subjects can finally return to the Nash equilibrium strategy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configuration of Pareto optimality in the whole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game analysi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oal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by taking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into account.

Key Word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green development

[编辑: 谭晓萍]